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王丽英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五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北冰洋研究（第五辑）

主 编：曲 枫

副 主 编：[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执行主编：王丽英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音序排名）

白 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崔向东（渤海大学）

范 可（南京大学）

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

郭培清（中国海洋大学）

郭淑云（大连民族大学）

何 群（内蒙古师范大学）

林 航（杭州师范大学）

刘晓春（中国社会科学院）

纳日碧力戈（内蒙古师范大学）

潘守永（上海大学）

祁进玉（中央民族大学）

曲 枫（聊城大学）

色 音（北京师范大学）

唐 戈（黑龙江大学）

汤惠生（河北师范大学）

夏立平（同济大学）

许永杰（中山大学）

杨 林（中国国家博物馆）

杨 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张小军（清华大学）

Ben Fitzhugh（本·菲茨休，美国华盛顿大学）

William Fitzhugh（威廉·菲茨休，美国史密森学会）

Guðmundur Hálfðanarson（古德蒙德·哈法纳森，冰岛大学）

Steven Hartman（史蒂文·哈特曼，冰岛大学）

Poul Holm（保尔·霍尔姆，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

Michael Knüppel（迈克尔·克努佩尔，聊城大学）

Thomas McGovern（托马斯·麦戈文，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Ben A. Potter（本·波特，美国阿拉斯加大学）

Peter Sköld（彼得·斯科尔德，瑞典于默奥大学）

编 辑

齐山德 王丽英 潘晓丽 奥莱格·琶莹磨夫（Oleg Pakhomov）

保罗·蒙哥马利（Paul Montgomery） 位礼齐（Richard Fraser） 姬荣连 高文丽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王丽英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⑤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卷首语

- 水上、冰上与陆上：人类历史进程的“终身流动性”…………… 曲 枫 /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 7

环境史与考古学

- 东北亚和北美西北地区的考古学模式：对德内-叶尼塞假说的考证
…………… [美] 本·波特 (张春波 赵文正 译) / 3
独立 I 期与萨卡克——最早的格陵兰人
…………… [丹麦] 比耶恩·格诺 (赵文正 译) / 50
鹿角与象牙：再议史前爱斯基摩文化研究的二元结构主义理论
…………… 曲 枫 (赵文正 译 曲 枫 译校) / 75

语言学研究

- 尤卡吉尔语中的非词汇化拟声词
……………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刘凤山 译) / 103
日常生活中的图瓦语变迁
——以图瓦人语言态度与语言选择为例…………… 娜荷芽 / 112
满语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 王海波 / 122

近北极民族研究

- 索伦部驻防呼伦贝尔的经过——以达斡尔族为例…………… 阿 力 / 139
俄罗斯族民歌的传承与保护——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为例…………… 李 萍 / 175
中国使鹿鄂温克人生存现状调查…………… 龚 宇 / 185

原住民再安置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萨米人的强制搬迁：历史与叙事

……………[瑞典] 刘静-赫尔默森 (刘凤山 译校 李耀辉 译) / 199

论加拿大政府因纽特民族“再安置计划”及其影响 ……潘 敏 包永康 / 217

前沿观察

人鸟互动神圣性与鸟类成功保护的关联性研究：以俄罗斯北极与中国
之间鸟类迁徙路线为例

……………[美] 福尔克·惠特曼 (丁海彬 译) / 240

格陵兰两个狩猎社区中的猎犬联盟

……………[意大利] 丹妮拉·托马希尼 (周圣涵 译) / 272

书评

栖居在北极家园——《北方民族志景观》书评……………张 雯 / 301
在学术研究和大众通俗读物之间架一座桥梁

——读《蓝狐岛》有感……………潘 敏 胡 荣 / 306

叶尼塞语中的阿尔泰语元素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刘凤山 译) / 312

学术动态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研究会……………柳 华 / 321

瑞典于默奥大学 (Umeå University) 北极中心：通过战略网络促进

和支持北极研究……………[瑞典] 莉娜·玛丽亚·尼尔森

尼古拉斯·埃克隆德 (姬荣连 译) / 333

瓦尔多的土著研究——瑞典于默奥大学萨米族人研究中心……………

[瑞典] 刘静-赫尔默森 克里斯特·斯图尔

莉娜·玛丽亚·尼尔森 (张丽红 译) / 341

第三届北冰洋研究高端论坛——“中国近北极地区呼伦贝尔研究”

学术研讨会在额尔古纳举行……………赵文正 / 352

征稿启事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59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60

CONTENTS

Preface

- On Water, Ice, or Land: Lifetime Mobility of Human History Qu Feng/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7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 Archaeological Patterning in Northeast Asia and Northwest North America: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ne-Yeniseian Hypothesis
..... Ben A. Potter (Translated by Zhang Chunbo and Zhao Wenzheng) / 3
Independence I and Saqqaq. The First Greenlanders
..... Bjarne Grønnow (Translated by Zhao Wenzheng) / 50
Ivory versus Antler: A Reassessment of Binary Structuralism in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Eskimo Cultures
..... Qu Feng (Translated by Zhao Wenzheng) / 75

Linguistic Research

- Non-lexicalized Onomatopoeia in Yukaghir Languages
.....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Liu Fengshan) / 103
Tuvan Language Change in Daily Life Na Heya/ 112
The Morphological Status of the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 Wang Haibo/ 122

Studies of Chinese Arctic Peoples

-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olon Aiman (Tribe) Stationing in
Hulun Buir—A Daur Perspective A Li/ 139
Inheriting, Reviving and Protecting Russian Folk Songs in Urgun
City, Inner Mongolia Li Ping/ 175
Investigation on the Survival Status of Reindeer Ewenki in China
..... Gong Yu/ 185

Indigenous Resettlement

- Sámi Forced Relocation in Sweden during 1920s—30s: History and Narratives
..... Jing Liu-Helmerson (Translated by Liu Fengshan and Li Yaohui) / 199
- The Inuit Resettlement Project in Canada and Its Impact
..... Pan Min Bao Yongkang/ 217

Frontier Observation

- On the Relevance of Spirituality for Human-Bird Interactions and
Conservation Success: An example from the Arctic Russia-China
flyway Falk Huettmann (Translated by Ding Haibin) / 241
- The Dog-Hunter Alliance in two Hunting Communities of Greenland
..... Daniela Tommasini (Translated by Zhou Shenghan) / 273

Book Review

- Dwelling on the Arctic Homeland Zhang Wen/ 301
- Bridg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pular Publications—Review on
Island of the Blue Foxes Pan Min Hu Rong/ 306
- Language Contact in Siberia. Turkic, Mongolic, and Tungusic loanwords in
Yeniseian Michael Knüppel (Translated by Liu Fengshan) /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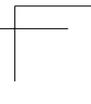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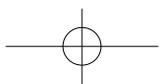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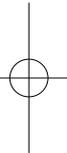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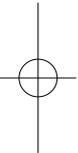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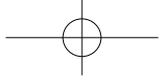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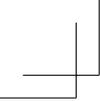
Academic Events

- The Inner Mongolian Society for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Evenki People
..... Liu Hua /321
- The Arctic Centre of Umea University, Sweden: Promoting and Supporting
Arctic Research through a Strategic Network Lena Maria Nilsson
Niklas Eklund (Translated by Ji Ronglian)/333
- Indigenous Research at Várdduo—Centre for Sami Research, Umea
University, Sweden Jing Liu-Helmerson Krister Stoor
Lena Maria Nilsson (Translated by Zhang Lihong) /341
- The Third Arctic Studies Forum held in Erguna
..... Zhao Wenzheng /352

Call for Submissions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Chinese) /359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360

近北极民族研究



索伦部驻防呼伦贝尔的经过

——以达斡尔族为例

阿 力

摘要：本文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原始档案资料，简述清廷从布特哈地区选派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等 3000 名兵丁驻防呼伦贝尔的经过，并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迁徙过程、翼佐编制、驻防体制的特点、最初两年的军事设施建设以及乾隆七年裁撤达斡尔等兵丁情况和海拉尔达斡尔人的形成加以阐述。

关键词：索伦部 驻防呼伦贝尔 海拉尔达斡尔人的形成

作者简介：阿力，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达斡尔学会副会长。

据学者们的考述，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对呼伦贝尔实质性的开发和建设是从辽代开始的。历经辽、宋、夏、金、元、明、清各朝对呼伦贝尔的经略，呼伦贝尔草原上到处都留下了人类文明的遗迹。清朝时期对呼伦贝尔的开发建设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雍正十年（1732）清廷从布特哈地区招募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等 3000 兵丁，组建八旗^①兵进驻呼伦贝尔驻防。这便是一部分达斡尔人永久驻防呼伦贝尔的起始。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发明创造，是以牛录^②为基层组织形式发展起来

① 雍正时期清廷组建八旗兵驻防呼伦贝尔，人们习惯上将其称为“索伦八旗”。有关呼伦贝尔八旗组织的各类名称详见本文第十二部分的内容。为方便叙述，本文均采用“索伦八旗”一说。

② 牛录：原本是满族传统的狩猎生产组织，后演变为八旗制度的基层组织单位。满语的“牛录”及“牛录章京”，在汉语中同被译为“佐领”。

的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它在清朝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正如一切事务都在发展变化一样，这种组织制度也是从原有的四旗发展为八旗，又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扩展为一些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集团构成的独立八旗。驻防呼伦贝尔八旗的组建，即是由这种不同民族集团构成的独立八旗的一种形式。在开发呼伦贝尔地区之初，清廷不惜人、财、物力，取消贡赋、赏赐牲畜、提供俸禄、加官进爵，甚至从齐齐哈尔等处“送往呼伦贝尔等处口米亦分兵丁磨之……圣主教养官兵，为其生计详谋，连红白事赏银，屡施鸿恩，赏赐行粮，以致官兵资生万年永享丰厚之仁意，实为至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2321）。清廷如此下大力气，以组建八旗军制形式来着手经营呼伦贝尔地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索伦部驻防呼伦贝尔的历史背景

首先从清俄方面来讲，《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划定了以外兴安岭、格尔毕齐河、额尔古纳河一线为清俄东段边界。由此，额尔古纳河成为“俄人由尼布楚入东三省水陆之咽喉”，呼伦贝尔一跃成了北疆最重要的门户和防俄越境的紧要之地。“呼伦贝尔一地，不独关系黑龙江省安危，而亦东三省一线命脉所系之枢纽也”（徐世昌 1965）。虽然两国间签订了“界约”和“条约”，但是，沙俄并未因尼布楚条约的规定而停止劫掠，小规模过界侵扰边境地区的事例仍频频发生，守卫边界保住疆土成为清廷的一件大事。因此，雍正帝在暗中秘密组建索伦部特种兵的同时^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1643—1644），为了抵制准噶尔同沙俄的勾结，加紧了与沙俄的边界谈判，雍正五年（1727）清廷与沙俄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1727年8月），俄国通过这个界约获得了清朝大片领土主权。而后，双方继续谈判，又签订了《阿巴哈依图议定书》（1727年10月23日）和《色楞额界约》（1727年11月7日），确定了恰克图以东、以西的清俄边界。到雍正六年（1728）九月，清廷与沙俄代表在恰克图正式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这是雍正朝签订的清俄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条约。

其次从清准（准噶尔）方面来讲，虽然准噶尔曾抵御和反击过沙俄对蒙古人的侵略，但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来，准噶尔部一直与清朝处于相

^① 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奉雍正帝密谕组建了索伦、达斡尔 2000 人的鸟枪部队。

抗衡的状态。在准噶尔与清廷的抗衡中，沙俄随时会与准噶尔结盟又一直为清廷所警惕和担忧。不得已清廷通过联姻和战争征服的办法加强对准噶尔的笼络和防范。康熙曾总结说，明朝仅“为恢复河套议论纷纷，若控驭蒙古有道，则河套虽为所据，安能为患？控驭无道，则何地不可为乱？”（《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83）可见蒙古在清统治者眼中的重要性。所以，清朝西北部边防主要防御准噶尔蒙古上层贵族的袭扰，是清廷与地方及民族间的矛盾。在这种棘手的局势之下，雍正帝不得不对清朝北部边疆的总体战略重新进行设计、部署，以缓解来自北方的种种压力。为加强防御，并就近训练军队，促使清朝朝廷立即着手经略呼伦贝尔。

（一）轮回巡防呼伦贝尔地区

在清廷组建八旗进驻呼伦贝尔以前，该地“归黑龙江将军管辖定察边之制，于中俄分界处岁以五六月间派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协领各一员，佐领、骁骑校各二员，兵各八十名（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尔毕齐、额尔古纳、莫里勒克、楚尔海图等河，巡视有无牧痕，以防侵越碑界，谓之巡边。三协领会书姓名、月日于木牌瘞（yi，埋藏）山上，明年查边者取归以呈将军副都统，又各瘞木牌以备后来者考验。此外还在中俄边界设有每年巡逻鄂博和每三年巡逻鄂博多处，定期派官兵巡逻边界”。例如，清雍正二年（1724），时任齐齐哈尔城镶红旗协领卓尔海、正黄旗协领达巴哈（巴尔虎蒙古人）等曾先后率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等卡伦巡防兵巡察呼伦贝尔中俄边境。又于清雍正五年（1727）建军营于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敖尔辉”地方^①（内蒙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85：70），并沿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河左岸国界设立了12处卡伦，“名曰外卡”，也称为“防俄外卡伦”。^②清廷对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河国界的这种“轮回巡防”制度，一直延续到雍正十年。可以说，如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查岗苏木的敖勒高鸿一地（今五泉山旅游景区），是清廷于雍正五年（1727）在呼伦贝尔地方设立的首处轮回巡边军队的驻军营地，换句话说，敖勒高鸿一地是清代呼伦贝尔驻军历史起始之地。至今，这里还有当时巡防军队所建立和祭祀的“莫英敖包”

① 笔者认为，与扎罗木德地方相毗连称为“敖尔辉”的地方当指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查岗苏木敖勒高鸿一地，现更名为五泉山旅游景区。

② 参见《呼伦贝尔地区总法·卡伦》《呼伦贝尔志略》《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册报志稿》卷七之《卡伦》。

的遗迹。^①

雍正七年（1729）二月，雍正帝发布了征讨准噶尔的命令，由北路（阿尔泰方面）、西路（巴里坤方面）两军发起了攻势。但在雍正九年（1731）六月，清军在与准噶尔大小策凌敦多布交战中失败，作为清军和通淖尔^②的重要军营被攻陷后，退至科布多。雍正十年（1732），准噶尔噶尔丹策凌亲自率军乘胜追击，清军节节败退，被迫丢弃正在建筑中的科布多城又向察罕叟尔^③退却。由此，从京城至北部清军的所有军营驿站路线全部被切断，外蒙古西部陷入混乱状态，大清北部边境受到了准噶尔的威胁。同年十月，清军北路副将军王丹津多尔济、额駙策凌等统领满洲、蒙古、索伦、达斡尔等20000余兵追击准噶尔噶尔丹策凌军，在厄尔得尼昭地方大败准噶尔军“杀贼万余，尸遍山谷，河流尽赤……余贼逃往鄂尔昆上游”。（《清世宗实录》卷122/13A—B）由此，北部战局趋于缓和状态，但是，清廷并未放松警惕，为预防准噶尔方面再度进攻，更加重视和加强对北部边境的防御。

（二）组建八旗驻防呼伦贝尔的缘起

清廷组建八旗驻防呼伦贝尔是组建整个东北防御体系的又一个延伸。早在清顺治十年（1653）清廷在今吉林设置了宁古塔昂本章京^④驻防。其后从康熙年间开始一直到雍正年间，东北八旗的组建都是以强化军事力量为目的进行的。而对这一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与《尼布楚条约》的缔结以及对准噶尔战争息息相关。

随着清廷对军事力量的不断需求，八旗组织的不断扩张，随之而来的就是兵源问题。为此，时任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于雍正九年（1731）十一月初八日提出了从黑龙江布特哈地区照京城之例挑选出1000名养育兵的建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3-0171-0165-007）。但是这一建议因为“养育兵仅支給一两钱粮，若使其离彼等原居之地，带来城中当差、行围，则于生计无益”而未被清廷采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3-0171-0165-008）。正在此时，每年

① “莫英”意为部队、军营之意。“莫英敖包”为清代军营部队所供奉祭祀的敖包，位于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嵯岗苏木莫和尔图村东南3公里，敖勒高鸿（即五泉山）以西不远处。

② 和通淖尔：地名，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国边界地区。蒙古语称湖泊为“淖尔”，所以也称“和通泊”。准噶尔与清军在和通淖尔地区展开一场战争，此战以清军失败而告终。

③ 察罕叟尔：地名，蒙语白尾之意，位于蒙古国乌里雅苏台以南。

④ 顺治十年（1653），清廷将宁古塔驻防官改为昂邦章京（相当于明朝的总兵），与盛京昂邦章京同为镇守一方之最高官员。

担任巡查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等地的达巴哈、博尔奔察（索伦人）为了改变极其艰辛的“轮回巡防”^①为“驻边守防”，在经过对布特哈地区兵源情况摸底调查后，向黑龙江将军卓尔海提出了调遣部分军队驻防呼伦贝尔的建议，并通过卓尔海将此建议转奏清廷。雍正九年（1731）十一月二十四日，雍正皇帝颁布的一条上谕中称：

询于达巴哈、博尔奔察，称布特哈索伦、达呼尔、巴尔虎之内，共可得三千兵。将此三千兵派出，于喀尔喀河、呼伦贝尔之周围查勘善地，将立业牧畜充足赏给，使其游牧驻防，教练马射、步射、放枪、击刺，选好地方建城……作为守城之兵，种地驻防。倘如此，数年之间，即成一旅精锐之良兵。若有行走之处，则无迟误。且于固守边疆之地，保护扎萨克等之游牧地，甚为有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1-0318-008）

可想而知，雍正帝调兵至呼伦贝尔的目的，是因为呼伦贝尔地方不仅与俄罗斯接壤，又处于喀尔喀蒙古等之游牧边缘，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为了抵制沙俄继续东进扩张，监护喀尔喀蒙古内讷，防御准噶尔势力在北疆的延伸而对清廷造成威胁，这几个因素成为清廷组建八旗兵驻防呼伦贝尔的主要动机。正是基于这种局势，雍正九年（1731）十一月二十七日，雍正帝立刻批准此提议，并传谕达巴哈、博尔奔察等进京面授机宜。同年十二月二日，达巴哈、博尔奔察等入京觐见奉旨：“尔等此去一切事务著与将军卓尔海会商办理”。于是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二十四日，总管达巴哈、头等侍卫博尔奔察偕同达斡尔二等侍卫托勒德尔、达斡尔三等侍卫莽古达，巴尔虎蒙古二等侍卫阿比锡克等前往“上谕所指地方勘察”，即呼伦贝尔地区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喀尔喀河和呼伦湖等地区，视察后形成了驻防呼伦贝尔的详细实施方案。

二、新建八旗兵丁进驻呼伦贝尔的经过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依据达巴哈、博尔奔察、托勒德尔、阿比锡克、莽古

^① 巡边极为艰辛，清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中写道：“草路弥漫，无辙迹，辨方而行。剝大树皮，以识归路。路多虻，如蜂，其长径寸，天无风或雨后更炽。行人尝虚庐帐以纳虻，而宿于外。帚十数齐下，人始得餐。螯马、牛流血，身股尽赤。马轶，觅深草间，见虻高如邱，知其必毙，弃不顾矣……”。

达等的考察汇报以及拟定的方案，于雍正十年（1732）三月二十八日联名呈奏京城朝廷。在此奏折中，对呼伦贝尔山川河流、草场林木等自然资源、边境地区的方位、驻兵地点、挑选兵源地及民族成分、具体数目、组建八旗旗佐的设想，分发兵器旗纛、官兵俸禄以及对牲畜的分配意见、试种一两年庄稼，暂且停止建造城池等提出了具体建议，同时在奏文中特别提出：“达斡尔人们，向来都以建筑房舍、耕种为生活的原故，可以先派遣其单身人去到新迁移所，进行耕种和建筑房舍以后，再把他们的眷属移去”。（内蒙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85：76—78）。表明了让达斡尔人先行建筑房舍和试种庄稼。

雍正皇帝阅完奏折旨意：“命军机大臣处进行磋商再行启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1-0318-008）。大学士鄂尔泰等接旨磋商后，于四月二十一日议复卓尔海等所奏于呼伦贝尔等地驻兵的方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1-0318-009）。与此同时，雍正帝因博尔奔察之功赏银一千两，《清世宗实录》卷 112）托勒德尔、阿比锡克、莽古达三人，各赏银四百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18-009-000003-0001-0086）。

依据大学士鄂尔泰等大臣的议复，雍正皇帝的御准，达巴哈、博尔奔察等人按照预定方案在布特哈诸部族之中共选得 3000 名兵丁，其中 1636 名鄂温克、730 名达斡尔、359 名鄂伦春、275 名巴尔虎蒙古等以及“再把各个人的户口上，不能够分开的、未经测量的闲散、幼丁和老弱、残废等定额男丁包括在内，共计 796 名（其中闲散西丹 737 人，年迈及患病之巴尔虎男丁 59 人）”。这样，最初选定迁往呼伦贝尔的兵丁及眷属人数总计为 3796 名。为其生计，按照奏文中的要求，清廷将达力岗嘎^①地方“骡马二万四千一百余匹、绵羊十万只”分配与驻防八旗兵丁。

达巴哈、博尔奔察等在布特哈地区招募兵丁结束后，临行前召集所有被选官兵眷属“齐集于会盟处（即楚勒罕）”^②，讲明了有关事宜，同时拟写了

① 达力岗嘎驼马牧场位于内蒙古锡林格勒盟以北，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以南，东起哈鲁勒陀罗海，西至额固特，南起察罕齐老山，北至济尔该图，是清代面积最大的牧场，隶上驷院兼辖。达力岗嘎羊群牧场约设于康熙中期，隶属于三旗牛羊群牧场总管兼辖，羊数定额为 10 万只。

② “楚勒罕”源于蒙古语“楚固拉干”一词，即“盟会、聚会”之意。是清政府为收取布特哈地区各族交纳貂皮而于康熙三十年（1691 年）设立的一个场所。据学者考察，最初“楚勒罕”的场所位于齐齐哈尔市西北 40 里的因沁屯（今音钦村）以北约 6 公里处的一片开阔地带。“楚勒罕”于咸丰年间废止，历经 165 年。

一份“官兵叩谢天恩折”转交皇上，其内容如下：

奴才卓尔海等谨奏：为转奏叩谢天恩事。切照几拉木台等处驻兵一事，由兵部咨行，于五月初十日来到选貂皮会盟处。奴才等即召总管达巴哈，所拣选官兵齐集，圣主施恩，赏赐马牛羊，每年获半俸之事，逐一晓谕，叩谢天恩后，官兵俱雀跃，围拢来奴才处，合掌叩称：我等俱如蝼蚁末等奴才，为圣主毫无寸效，且由我等祖父至此，赈救数次，屡赐生业，实难记清。今为将奴才我等迁往几拉木台等处，复蒙圣主施恩，蠲免貂贡，给予生业，赏足马牛羊，又获半俸饷。圣主此殊恩，奴才安能报答。惟虔诚祈祷圣寿万万年，奴才等世享圣主养育无穷如天地高厚之恩。除此之外，奴才等莫可言喻。请将我等欢欣雀跃之情转达天听，等情。频频叩告。为此将叩谢天恩之处，谨转奏以闻。奴才卓尔海、奴才宗室张格。（朱批：知道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2120）

遵照雍正帝：“尔等勘验过地方，将丁壮挑选完毕后，著博尔奔察将地图带来奏上，达巴哈领所选之兵，趁草青迁往”的谕旨，一路由博尔奔察将绘制的地图带往京城，一路由达巴哈于雍正十年（1732）润五月七日，带领被拣选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兵丁由齐齐哈尔楚勒罕地方出发，赶往驻防目的地呼伦贝尔。雍正十年（1732）七月十六日《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总管达巴哈率兵前往海拉尔等处折》中记载：

切总管几拉木台地方军总管达巴哈呈称：达巴哈亲率新迁之索伦、达斡尔、巴尔虎官兵，于润五月初七日（注：阳历6月28日，本月至30日）辰时启程，本月二十三日（注：阳历7月14日），俱安善迁至海拉尔、几拉木台等处。等情。为此谨具奏闻。奴才卓尔海、奴才宗室张格。（雍正皇帝朱批：知道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2139）

从以上奏折中可以看出，被派往呼伦贝尔驻防的全部兵马首先齐集在楚勒罕地方，浩浩荡荡开进呼伦贝尔后，分兵驻扎在海拉尔（伊敏河入海拉尔河口）以及与“敖尔辉驻兵处所相毗连”的几拉木台（今扎罗木得）等处。不言而喻，如今的扎罗木得一地，正是组建八旗兵首处安宅扎营之地。八旗兵落脚扎罗木得开始，便从这里翻开了保卫、开发和建设呼伦贝尔的历史篇

章。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等 3000 名将士以及他们的随属即为翻开这一历史篇章第一页的第一人。

清廷采取从布特哈抽调兵丁赴呼伦贝尔驻防的措施，是由于呼伦贝尔“北控俄罗斯，南抚喀尔喀，山河险要”，其地理位置在清朝版图上占有特殊的重要位置。专门拣选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等兵丁来驻防，除地域相近，生存的地理环境相同以外，主要考虑到他们的军事素质。索伦、达斡尔以武见长，康熙朝和雍正朝中都有许多令人赞叹的英勇事迹和记述。因此，让这部分人驻守边疆，一方面与强悍的外敌沙俄形成对峙，保证边疆的安全，同时对防止准噶尔势力的延伸，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另外也表明清廷对他们忠诚的信仰以及顽强的战斗力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总而言之，被调遣驻防于边陲的索伦部民众，被编入八旗，成为披甲，免除了他们的贡赋，由国家赏赐牲畜、分发俸禄，为他们无偿提供军械、粮饷，甚至“连红白事赏银，屡施鸿恩”，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尊严的职业军人，国家有责任保障他们的生活来源。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件事是，清朝政府调遣部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等民族驻防呼伦贝尔，是为了对这些民族的统治而“分而治之”呢，还是基于戍边驻防的需要呢？（包括乾隆年间西迁新疆的达斡尔、鄂温克等）对此，有些学者提出了：“清朝统治者为了削弱索伦部的地方势力，通过采取‘分而治之’，达到‘众建而分其势’的目的，将部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等人民调遣呼伦贝尔的同时，还将另外一部分达斡尔、鄂温克人民调往新疆等地，使他们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散居各处”的观点。对此，笔者依据对当时的诸多公文奏折以及对当时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清廷组建八旗进驻呼伦贝尔虽然有“分而治之”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国家需要。

三、“索伦八旗”翼佐的编制、防区及牧地的划分

（一）翼佐的编制

雍正十年（1732）五月十五日，索伦左翼总管达巴哈将进驻呼伦贝尔编设八旗佐领的详细情况呈报黑龙江将军衙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1732）。现将当时编设八旗佐领的人员名单以表格形式展示如下：

表1 雍正十年(1732)驻防呼伦贝尔编设八旗佐领情况

索伦八旗			
左翼总管	达巴哈	右翼总管	博尔奔察
左翼设四旗计25个佐,其中镶黄旗7个佐;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各6个佐。		右翼设四旗计25个佐,其中正黄旗7个佐;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各6个佐。	

表2 雍正十年(1732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左翼四旗之镶黄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镶黄旗			
索伦副总管里布齐勒图			
第一佐佐领	珠鲁克都	骁骑校	乌唐阿(署理领催)
第二佐佐领	瓜察	骁骑校	喀尔玛丕(署理领催)
第三佐佐领	乌尔巴哈第	骁骑校	德济乌勒
第四佐佐领	阿勒精阿	骁骑校	布尼德依
第五佐佐领	扎里乃(署理骁骑校)	骁骑校	古尔格勒图
第六佐佐领	崩库塔(鄂伦春)	骁骑校	噶扎勒图
第七佐佐领	孟纳	骁骑校	依德勒图
领催、 ^① 皮甲420名;已及比丁西丹70名;未及比丁西丹40名;兵丁共计545名。			

表3 雍正十年(1732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左翼四旗之正白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正白旗			
达斡尔副总管托勒德尔			
第一佐佐领	袞泰	骁骑校	苏尔巴岱
第二佐佐领	阿纳勒图(署理骁骑校)	骁骑校	车依沃(署理领催)
第三佐佐领	伯勒图(署理骁骑校)	骁骑校	罗保; 清廷指派笔贴式:提第
第四佐佐领	喀都里(索伦)	骁骑校	乌色勒图(署理领催)
第五佐佐领	齐尔齐喇(署理骁骑校)	骁骑校	格尔毕琛(署理领催)
第六佐佐领	讷棱车(鄂伦春)	骁骑校	雅玛拉
领催、皮甲360名;已及比丁西丹80名;未及比丁西丹40名;兵丁共计494名。			

① 领催:清代官名,满语“拨什库”,催促人的意思。汉名“领催”。管理佐领内的文书、餉糈庶务。又有“分得拨什库”,是佐领的副手,汉名“骁骑校”。

表4 雍正十年（1732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左翼四旗之镶白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镶白旗			
索伦副总管毕里浑			
第一佐佐领	乌齐内	骁骑校	巴达希（署理领催）
第二佐佐领	乌里勒图	骁骑校	布喇勒图（署理领催）
第三佐佐领	德尔精额	骁骑校	都热克依
第四佐佐领	乌默西（署理骁骑校）	骁骑校	布勒塔噶尔（署理领催）
第五佐佐领	阿勒塔赖（署理骁骑校）	骁骑校	乌尔巴喀察（署理领催）
第六佐佐领	额星古勒图	骁骑校	特沃尔济
领催、皮甲 360 名；已及比丁西丹 86 名；未及比丁西丹 40 名；兵丁共计 499 名。			

表5 雍正十年（1732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左翼四旗之正蓝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正蓝旗			
达斡尔副总管莽古达			
第一佐佐领	塔齐苏	骁骑校	穆尔斋
第二佐佐领	济勒本	骁骑校	肯德威（署理领催）
第三佐佐领	图很德依（署理骁骑校）	骁骑校	沃勒德（署理领催）
第四佐佐领	罗尔布哈尔（索伦）	骁骑校	罗伯托
第五佐佐领	额尔齐岱（署理骁骑校）	骁骑校	塔尔盖
第六佐佐领	乌尔庆额（鄂伦春）	骁骑校	宁古车
领催、皮甲 ^① 360名；已及比丁西丹62名；未及比丁西丹40名；兵丁共计475名。			

表6 雍正十年（1732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右翼四旗之正黄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正黄旗			
副总管波罗纳（由清廷专派满族官员）			
第一佐佐领	噶尔兆图（达斡尔）	骁骑校	贾木保（署理领催） 清廷指派笔贴式：乌扎乃
第二佐佐领	达勒果勒	骁骑校	冲恰（署理领催）
第三佐佐领	昂加图	骁骑校	德呼尼
第四佐佐领	德折勒图（署理骁骑校）	骁骑校	庆吉勒
第五佐佐领	果罗都（署理骁骑校）	骁骑校	济尔库勒德依（署理领催）
第六佐佐领	诺米岱	骁骑校	延讷（署理领催）
第七佐佐领	特沃勒德尔（署理索伦骁骑校）	骁骑校	纳孙
领催、皮甲 420 名；已及比丁西丹 73 名；未及比丁西丹 40 名；兵丁共计 549 名。			

① 披甲：满语称作乌克申，蒙语称胡雅嘎，汉译为马甲，俗称披甲。披甲负担卡伦驿站义务时要携带其家眷一同前往，出征时自备马匹等，差役繁杂苦重。其俸禄为半响，每月饷银1两。

表7 雍正十年(1732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右翼四旗之正红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正红旗			
索伦副总管特东额			
第一佐佐领	满达喇	骁骑校	伯伦车
第二佐佐领	察古赖	骁骑校	多尔本察
第三佐佐领	达尔巴噶尔	骁骑校	达桑阿
第四佐佐领	玛尔达喀	骁骑校	萨扎勒图
第五佐佐领	尼尔吉达	骁骑校	英纳西喀
第六佐佐领	科尔托浑	骁骑校	英古察
领催、皮甲 360 名; 已及比丁西丹 153 名; 未及比丁西丹 40 名; 兵丁共计 566 名。			

表8 雍正十年(1732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右翼四旗之镶红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镶红旗			
巴尔虎副总管阿比锡克			
第一佐佐领	布勒图罗	骁骑校	默勒克依
第二佐佐领	额尔德尼	骁骑校	布拉克
第三佐佐领	珠瓦齐	骁骑校	扎玛颜
第四佐佐领	莫多玛勒	骁骑校	济尔巴
第五佐佐领	莫绰依(由清廷专派官员)	骁骑校	袞楚克(署理领催)
第六佐佐领	锡尔哈(索伦署理蓝翎)	骁骑校	必里克(署理领催)
领催、皮甲 360 名; 已及比丁西丹 151 名; 未及比丁西丹 43 名; 兵丁共计 567 名。			

表9 雍正十年(1732年)驻防呼伦贝尔索伦右翼四旗之镶蓝旗各佐佐领及骁骑校名单

镶蓝旗			
索伦副总管阿尔斌察			
第一佐佐领	绰托	骁骑校	腾吉勒图
第二佐佐领	乌勒申	骁骑校	阿鲁木索(署理领催)
第三佐佐领	索济勒图(署理蓝翎)	骁骑校	达欣察(署理领催)
第四佐佐领	车齐尔	骁骑校	额米雅勒图(署理领催)
第五佐佐领	多西克尔(鄂伦春)	骁骑校	恩腾额
第六佐佐领	(不详)	骁骑校	(不详)
领催、皮甲 360 名; 已及比丁西丹 ^① 60 名; 未及比丁西丹 40 名; 兵丁共计 473 名。			

① 西丹,意为幼丁,清代八旗中未成年而将要成丁之人称为幼丁,是八旗正规兵丁的后备力量。《御制增订清文鉴》称“未及丁的孩童,叫做‘西丹’”。陈鹏先生的《清代东北地区布特哈八旗探研》考证:“索伦各部男子……凡年龄 15 岁、身高五尺者一律编为西丹,作为预备役。”

在组建“索伦八旗”初始，雍正帝曾经提出“朕意索伦、达斡尔、巴尔虎各设总管，统管其事……各管所属为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730）。所有官员“均由布特哈地方现任、署理、委用各员内选派”的要求。从实际翼佐编设情况来看，在基本保持各民族间的部落组织形式的同时，也都存在有不同民族混编情况。且从正白旗第三佐和正黄旗第一佐中各配一名笔帖式来分析，推断达巴哈总管驻在正白旗，博尔奔察总管驻在正黄旗。

表 10 雍正十年（1732），“索伦八旗”初始 50 佐领主体民族分析（包梅花 2012）

索伦八旗	旗别	佐数	兵丁族别
	镶黄旗	7	以索伦人为主体的，有部分鄂伦春人混居。
	正白旗	6	以达斡尔人为主体的，有部分索伦人和鄂伦春人混居。
	镶白旗	6	全部都是索伦人。
	正蓝旗	6	以达斡尔人为主体的，有部分索伦人和鄂伦春人混居。
	正黄旗	7	主体民族不清楚，由部分达斡尔人和索伦人混居。
	镶蓝旗	6	以索伦人为主体的，有部分鄂伦春人混居。
	正红旗	6	全部都是索伦人。
	镶红旗	6	以巴尔虎人为主体的，有部分索伦人混居。
计	八旗	50	

表 11 职官及兵丁数目（包梅花 2012）

旗色	副总管族别	佐领	骁骑校	笔帖式	领催、披甲	已及比丁之西丹	未及比丁之幼西丹	总计
镶黄旗	1（索伦人）	7	7	无	420	70	40	545
正黄旗	1（满族人）	7	7	1	420	73	40	549
正白旗	1（达斡尔人）	6	6	1	360	80	40	494
正红旗	1（索伦人）	6	6	无	360	153	40	566
镶白旗	1（索伦人）	6	6	无	360	86	40	499
镶红旗	1（巴尔虎人）	6	6	无	360	151	43	567
正蓝旗	1（达斡尔人）	6	6	无	360	62	40	475
镶蓝旗	1（索伦人）	6	6	无	360	60	40	473

从清廷对“索伦八旗”的归属、官员配制以及翼佐编设的情况来看，并不完全信任这支队伍，清廷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不仅体现在翼佐的编制，满族官员的穿插监督，更是从第一年的年末开始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措施：

(1) 严格掌控，分化统一性，“众建之而分其为”。名义上索伦总管为“索伦八旗”的军事指挥官，但受驻防将军、都统、大臣奏调。而这些将军、都统、大臣多为满族贵族，他们代表清廷行使对地方武装的监督、控制。另一方面，为了削弱“索伦八旗”的统一性，不使其形成统一行动的力量，限制其势力的发展，雍正十一年（1733）夏，雍正帝谕旨将驻防“索伦八旗”兵三千名内，调拨二千名前往察罕叟尔军营，将一个八旗组织分成两个部分，分散了统一力量，以此来避免“索伦八旗”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以威胁其统治。

(2) 将“索伦八旗”编入内属八旗体制，采取直接由朝廷对其执行各项统治的措施，严格控制对官员的任用。清廷于雍正十一年（1733）七月初三日议准，将呼伦贝尔之索伦、达斡尔、巴尔虎编入上三旗（即指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1-0167-007），由皇帝直接掌控。虽然清廷制定了对“索伦八旗”总管以下官员均由本旗原有族民中选任，但没有任期限制，采取了“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按其考绩、战绩等个人素质来任用的措施。这些管制的变更，既是因为索伦、达斡尔等曾反抗过清帝国的结果，又体现了清廷施行强化汗权政策。

(3) 强化对“索伦八旗”的领导统治力度，直接由京城指派官员进行统治。雍正十年（1732）底，清廷在派出护军统领博第至呼伦贝尔之后，雍正十二年（1734）又派盛京兵部侍郎永福“统辖呼伦贝尔兵丁”。雍正十三年（1735）又由京城简派内大臣哈达哈为统领协同永福管辖呼伦贝尔八旗。自此开始，呼伦贝尔即专由朝廷“简派大臣一员，加副都统衔，以三年为任期，坐镇其地资统率”的形式进行管理。

(4) 严格控制索伦八旗军队的武器装备。“索伦八旗”壮丁服役时所需武器必须具文呈报理藩院核准，采购数量较大还得由理藩院上报朝廷批准。任何地区，任何人都不得超过所批准的数量，否则不仅没收违法多买的部分，而且对当事者治罪。

（5）严密对“索伦八旗”的监视、监督。在组建八旗时，在其翼佐配制中，将原黑龙江将军衙门主事满族人波罗纳委以正黄旗副总管，对各级官员的言论行为动向等情况及时向朝廷密报，一旦发现问题随时撤职调换。

以上对驻防呼伦贝尔八旗采取的这些措施，均表明了清统治者当时对他们不完全信任以及存有防备心理。

（二）防区及牧地的划分

驻防八旗兵进驻呼伦贝尔以后，呼伦贝尔全境成为“索伦八旗”的防区，以左右两翼划分防区，游牧驻守边境。其左翼四旗驻牧在通往俄罗斯道路边境一带，右翼四旗驻牧在哈拉哈河喀尔喀蒙古边界一带，这是清代对呼伦贝尔区域划分的起始。

（三）赏赐牛马羊及官兵俸饷、恩赏军用物资

依据卓尔海等在奏折里提出对兵丁赏赐生业的方案，清廷均予以兑现。

赏赐牛马羊方面：“清廷赏赐移驻呼伦贝尔兵丁马一万五千七百三十四匹、奶牛九千七百三十四头、羊九万五千一百四十只。其中，奶牛按每头价银五两计，折赏银两共需价银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两，由户部派员送往驻兵之地，分别赏给各官兵，从容购买立业。管理呼伦贝尔地方兵总管博尔奔察、达巴哈呈称：‘将赏赐为生业之马、羊、奶牛之银两，自雍正十年（1732）六月十九日至七月十四日，相继接受’。清廷的这次赏赐为以后呼伦贝尔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包梅花 2012）

赏赐官兵奉饷方面：清廷按照其他八旗官兵兵丁之一半相应给“索伦八旗”官兵发放半俸，但可提前支取，兵丁每月各发钱粮银一两。与此同时对八旗所需的旗纛、兵械、绵甲等给予了“无一遗漏”的配备。

四、防俄卡伦的建设

东北地区的卡伦大约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主要目的是为了实施各种封禁、稽查、征收等任务而设置的内地卡伦。随着沙俄的入侵，开始设置边境卡伦。雍正五年（1727）在呼伦贝尔境沿额尔古纳河岸设置的12处卡伦就是出于这种目的。雍正十年（1732）清廷组建“索伦八旗”兵驻防呼伦贝尔，由此，驻防呼伦贝尔的各族官兵承担起建设驻守卡伦，巡护边境和保卫祖国领土不

受侵犯的神圣职责。

（一）防俄外卡伦的建立

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清朝政府为了防御沙俄的侵入，按《尼布楚条约》所划定中俄边界走向共设立了 59 处卡伦，其中在呼伦贝尔沿中俄两国国界线满洲里起至额尔古纳河上游的珠尔特依止，即清朝边界一侧设置了 12 处卡伦。“名曰外卡”，也称为“防俄外卡伦”（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 1986）。在设置这些卡伦时清廷认为“呼伦贝尔最重，布特哈、黑龙江次之”（徐宗亮），对呼伦贝尔与俄罗斯边界卡伦的建立给予特别关注。这些卡伦由黑龙江将军管辖，轮派呼伦贝尔索伦、达斡尔兵驻守。卡伦每处驻防官一员，兵丁 30 名。每两卡伦之间设一鄂博（即敖包），卡伦官兵每日巡查，三月一更。同时，每月派遣总管一名、佐领二名进行巡查一次。每处卡伦备有蒙古包四顶，每年拨给修补费用。

表 12 呼伦贝尔外卡设置

外卡（卡伦名称）	设置时间	卡伦间距	对岸俄屯名
珠尔特依卡伦	雍正五年	距锡伯尔布拉克卡伦 46 里	洽罗布其
锡伯尔布拉克	雍正五年	距巴延珠尔克卡伦 60 里	
巴延珠尔克	雍正五年	距乌雨勒赫齐卡伦 42 里	别勒维伊布得雷
乌雨勒赫齐	雍正五年	距巴雅斯呼朗温都尔卡伦 53 里	
巴雅斯呼朗温都尔	雍正五年	距巴图鲁和硕卡伦 55 里	则尔果里 (今译佐尔戈尔)
巴图鲁和硕	雍正五年	距库克多博卡伦 60 里	新楚鲁海图
库克多博	雍正五年	距额尔德尼托勒辉卡伦 80 里	
额尔德尼托勒辉	雍正五年	距孟克锡哩卡伦 80 里	
孟克锡哩	雍正五年	距阿巴噶图卡伦 60 里	开拉苏
阿巴噶图	雍正五年	距苏克特依卡伦 70 里	
苏克特依	雍正五年	距察罕鄂拉卡伦 60 里	
察罕鄂拉	雍正五年		

（二）防俄内卡伦的建立

由于“外卡伦防守多疏，时有俄人越界”（巴岱等 1992），沙俄不断向中国边境移民进行侵略扩张，蚕食领土。总管达巴哈、博尔奔察等人在进驻呼伦贝尔的当年十一月依照清廷的指令，即刻对边境进行实地考察，并根据边防需要，向黑龙江将军卓尔海提出了增设卡伦以及如何派遣官兵等方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80：589）。这项方案于雍正十一年（1733）获准后，呼伦贝尔在外卡的内侧增设了 15 处卡伦，力图“以资联络”，这一批新设的卡伦称为“内卡伦”，也称为“防俄内卡伦”，均由进驻呼伦贝尔的索伦部兵丁于雍正十一年（1733）建设，并派兵驻守。

由清一代，呼伦贝尔一带的边境卡伦建设多有变化，不管卡伦是增是减，如何变异，呼伦贝尔的各族官兵仍然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远离妻子儿女，驻防在偏远的卡伦驿站，克服种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为边疆的防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表 13 呼伦贝尔内卡设置

内卡（卡伦名称）	设置时间	咸丰七年改设后名称	距离里数
库勒多尔河	雍正十一年	西伯尔昂阿	距呼伦贝尔城 500 里
特尔墨勒津河	雍正十一年	迈罕图	距上卡 60 里
特尼河	雍正十一年	察拉奇昂阿	距上卡 57 里
崇古林谷口	雍正十一年	色格勒吉舍哩	距上卡 55 里
依拉该图	雍正十一年	郭尔比舍哩	距上卡 50 里
阿尔噶图谷口 （哈济）	雍正十一年	阿鲁胡都克	距上卡 50 里
沙拉鄂索谷口	雍正十一年	西里呼都克	距哈济卡伦 70 里
萨奇勒图山	雍正十一年	布木伯诺尔	距沙拉鄂苏卡伦 40 里
温都尔额埒苏	雍正十一年	阿尔山布拉克	距翁昆卡伦 50 里
翁昆	雍正十一年	固勒特格	距萨奇勒图山卡伦 39 里
乌兰昂阿	雍正十一年	乌勒拉吉布拉克	距温都尔额埒苏卡伦 49 里

(续表)

内卡(卡伦名称)	设置时间	咸丰七年改设后名称	距离里数
布拉克图舍哩	雍正十一年	达西玛克布拉克	距乌兰昂阿卡伦 70 里
摩该图舍哩	雍正十一年		
托勒辉图舍哩	雍正十一年		
鄂勒图舍哩	雍正十一年		

五、驿站的建设及开通交通要道

(一) 驿站建设

清廷视呼伦贝尔为要冲之地,为了通达边情,供给军民生活用品,动员进驻呼伦贝尔的各族官兵,在进驻呼伦贝尔的当年就开发了由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驻地)至今海拉尔的十处驿站。这 10 站是:齐齐哈尔——西勒图——纳齐希(今甘南县)——蒙古勒乌克察起——额赫昂阿——巴里玛——延博霍托——霍洛起——们都克依——雅克萨——集尔玛大——呼伦贝尔。这条驻路为辽金古道,从蒙古勒乌克察起站以西,均沿雅鲁河和海拉尔河西行。乾隆元年(1736)调整各站之间距离并延长,设 17 站,长 898 里。这些驿站不但把广大的边疆地区联系起来,而且把边疆地区与内地联成一体,保证了呼伦贝尔地区与外地通信的畅达和物资的转运,对打击外敌的入侵,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开通交通要道

达斡尔人使用牛车具有悠久的历史。如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嫩江流域依靠的是牛车,从嫩江流域迁徙呼伦贝尔同样使用的是牛车。达斡尔人凭借娴熟的传统造车技能,家家户户拥有数十辆甚至几十辆的牛车,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末,海拉尔达斡尔人的牛车拥有量近千辆,一度成为呼伦贝尔商业往来的主要工具。达斡尔人的牛车运输线路,以海拉尔为中心覆盖呼伦贝尔全境的同时,东赴布特哈、齐齐哈尔,西达桑贝子(今蒙古乔巴山)、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北及恰克图,南涉乌珠穆沁左、右翼旗、多伦县、张家口等地。因此有人说,清代呼伦贝尔的交通道路是牛车开拓出来的。

表 14 海拉尔达斡尔人主要长途运输往返线路

巴彦托海——卜奎（齐齐哈尔）	生产生活用品贸易
巴彦托海——桑贝子（今乔巴山市）	易货贸易
巴彦托海——新巴尔虎左、右旗	1. 春季：把海拉尔的粮食运出去，把商人和俄国人收购的畜产品运回海拉尔。 2. 夏季：将商人收购的畜产品和广信公司经营的盐、碱运回海拉尔。 3. 冬季：去达赉湖把俄国人经营的冻鱼运回。
巴彦托海——吉拉林	夏季走库克多博旧驿路，沿边境卡伦向北至吉拉林，冬季直达。主要贸易为粮食、木材等。
巴彦托海——甘珠尔庙	主要为庙会集市贸易。此路可达桑贝子、库伦、乌珠穆沁右翼旗、张家口、乌珠穆沁左旗经多伦入古北口大道，为传统贸易商路。
巴彦托海——贝尔湖	鱼类特产贸易。
巴彦托海——珠而毕特盐池	距海拉尔以北 200 余里，运送盐、碱、硝等。
巴彦托海——乌克尔图盐池	距满洲里西南百余里，运送盐、碱、硝等。
巴彦托海——阿尔山温泉	向东南延伸经索伦、洮南到达奉天，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等。
巴彦托海——多伦县	主要将呼伦贝尔的盐等货物运至多伦县。
巴彦托海——张家口	运回布料、砖茶、绸缎、衣物等。
巴彦托海——锡尼河——红花尔基	运输自家用的木材等。
伪满时期	被雇用军用品及军事设施材料的运输。



图 1 运送饲草的牛车队

六、筑建海拉尔军营城堡的达斡尔人

“索伦八旗”兵进驻呼伦贝尔后，并没有急于筹建永固的城堡建筑，而首先在扎罗木得搭建简易兵营衙署，按照游牧民族的特点划分各旗翼佐防区，并将设立关卡驿站、驻卡巡边、军事训练、应征参战以及试种小规模农田的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按照初设八旗时的奏文内容，达斡尔人在建筑海拉尔城以及开发试种农业的生产中起到了中坚作用。

对于海拉尔的筑城年代，学者们有着各不相同的见解。有主张建于雍正十年（1732）的，有主张建于雍正十二年（1734）的，也有主张建于乾隆年间（1738年以后）的。笔者认为，当时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上奏的“建城”，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当时所讲的“城”其实是指军队的大本营而言，是通过筑建军营城堡来表明清廷在这一区域军事地位的确立。

在“索伦八旗”军进驻呼伦贝尔后，军事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呼伦贝尔纪略》中所说“改勘地址”选择海拉尔地方建城，是指最初打算将军队的大本营设在扎罗木得，而后改勘地址选择在伊敏河入海拉尔河口处设营而言，同时决定“拟暂于一二年游居，试之耕种，如能丰收，再行呈请建城”，“定议后迄未修筑”。这是雍正十年（1732）卓尔海等最初进入呼伦贝尔所议定后上奏朝廷的事。显而易见，在最初上报的时候，筑城只是为了满足八旗官兵的需求而已。由于扎罗木得一带霜降太早等缘故，雍正十二年（1734）决定将索伦八旗军队的大本营及衙门寓所改勘建设于伊敏河左岸“城（军营）西门外，偏北西沙山之阳”，即“哈日巴图鲁那日斯”（今海拉尔区西山樟子松林）之阳。经过两年时间的建设，初步形成军营规模，人们习惯称其为城。

雍正十二年（1734）至雍正十三年（1735），“索伦八旗”军建筑“前后相连，周围各绕土墙，高六尺”的军营大本营。其主要建筑为：“大堂和传堂各一所，各计五间。印务处一所计三间。左右两司各一所，各计四间。官印室，银库，兵置库各一所，各计两间。档案室一所计三间。索伦、巴尔虎八旗兵器库八所，计十六间；额鲁特一旗兵器库一所计两间。守卫兵器库的守望室两所计四间；大门一所计三间；东西栅栏门两个。衙门寓所也是在雍正年代建筑的。正房一所计五间，东西厢房各一所计四间，书斋一所计三间，二门一所，大门一所计三间。监狱室也是在雍正年代所建筑的。囚房一所计三间，围绕监狱的用木竖起的障子，从长有二十四丈，从高有一丈五尺。看

守监狱的守望室一所计两间，按照期限，轮流地来重新修补。大药库也是在雍正年代所建筑的。火药库一所计三间，船弹库一所计三间。练武厅也是在雍正年代所建筑的。射击亭一所计三间，守望室一所计两间”（内蒙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85：132—133）。以上这些建筑看不出民房或商户，均为军事设施和衙门寓所，所以它是实实在在的军队大本营。这一时期，呼伦贝尔一地并没有随军行商商户的记载，军队所需粮菜及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正如当时的奏折中所说，均由布特哈、齐齐哈尔等地运入供给或通过卡伦与近处俄蒙进行小型的边境贸易^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2-0437-016）。依据清朝时期对行军征战中所建临时性或较长久性的军营，一般都称为“城”。例如，康熙年间所建的“查干叟尔城”“乌兰布通城”等，都属于较长久性的军营，围墙及营房一般都用土木垒建。另外，乾隆年间在征战金川、台湾等处所建，至今被称为“土城”的军营，都属于征战中所建的军营，营房一般都是帐房或土房。这些军营都是就地取材，或搭建木栅，或挖土筑墙形成。

直到乾隆初期，由于呼伦贝尔地区“交易往来越兴安岭而至齐齐哈尔，道险而远”，特“招山西行商”来海拉尔地方设铺开行，进行贸易。这些商号先后“筑土房为围，划清街道”，距军营衙门的东侧始建商房店铺，慢慢形成了“周四里余，就商户市房为垣，缺处间筑土障，高丈许”的“蒙旗会集场”。这样，呼伦贝尔八旗军营、衙署以及商行等建筑群，成为“海拉尔城”城区雏形。因此，乾嘉时代的海拉尔城尚不完全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城池的基本形态。

综上所述，海拉尔城的建设是较缓慢的过程，是在八旗兵自雍正十二年（1734）建设军营衙署以及进入乾隆年后，八大商号开始陆续落脚呼伦贝尔建设商房店铺，道光年间设立南北大门，光绪年间中东铁路铺设的基础上，经过逐渐发展，不断扩大，不断完备，成为了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中心城。在海拉尔城（军营）的初建中，“向来都以建筑房屋、耕种为生活”的达斡尔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呼伦贝尔这个紧靠俄蒙边境荒无人烟的偏远地区，建成初具规模的海拉尔城，标志着一个草原新城的诞生，其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①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月二十一日“寄谕黑龙江将军富僧阿着黑龙江卡座与俄交易杂货不必禁止”一折称：“现在恰克图停止贸易，巡边兵丁，宜应禁止带货与俄罗斯交易，俟恰克图开市后，再行交易……若彼处索伦等照旧与俄罗斯交易零星物件，则不必禁止，仍准交易”。题本：03-132-2-053。



图2 20世纪初海拉尔正阳街北门城楼

城门是为了便于管理商户，收税而设，因为城门以内的地方“商户市房小铺甚多，此为海拉尔繁盛之区，蒙人之车马往来均于此通过之，蒙人之交易货物者，亦咸集于此。”

七、开拓清代呼伦贝尔农业的达斡尔人

清廷在经营呼伦贝尔善后问题酝酿之初，就把“屯垦开发，以边养边”作为经济上立足久远的策略。然而，受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地区的农业开发走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

（一）雍正时期呼伦贝尔农业的艰难起步

从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呼伦贝尔地区农业开发的进程从海拉尔河、伊敏河、辉河、维特很河、格尼河等流域开始起步，其东端在今博克图一带以及“兴安山岭之阳，鄂木博齐及雅尔和鼐等处，西端在今新巴尔虎右旗的“额布都克布拉克地方”进行试种开发。

据史料记载，在迁来呼伦贝尔的当年（即1732年）就试种过五谷粮物。但由于气候以及落后生产方式几乎遭到绝产。雍正十年（1732）八月十二日，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向雍正皇帝奏报在呼伦贝尔地区试种五谷情形折中称：

窃奴才等遵旨，派遣总管博尔奔查、达巴哈等携带八旗八棍，前往几拉木台（即今扎罗木德）地方择良土试种田亩。七月十四日，据总管博尔奔察、达巴哈等呈称：今年四月内，由八旗遣出八棍，于几拉木台、布克图（今博克图）、特尼克（今特尼河）、伊奔（今伊敏河）、齐讷克（今鄂

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嵯岗苏木政府所在地西侧)、威特克(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维特很河)等处试种大麦、麦子、油麦、大黄米、荞麦等五谷,播种于几拉木台关迤东布克图、特尼克、几拉木台地方之庄稼因遭夏旱,竟未生长,且于六月十九日因降白霜,此三地所播庄稼俱受损。自几拉木台关至海拉尔河下游伊奔、齐讷克、威特克等三地所种庄稼虽遭旱,但仍长高至膝盖,半已黄熟……奴才等在此三地,来年仍交付博尔奔察等择沃土耕种。为此谨具奏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 2142)

雍正皇帝接到这个奏折后,于当年十一月八日,谕旨军机大臣:

据索伦总管博尔奔察等奏称,呼伦贝尔等处,今岁所种地亩,因旱歉收,俟明年多为种植等语。朕思种地一事,如交与伊等,则训练兵丁,必致贻误,著行文将军卓尔海,于齐齐哈尔、瑷琿、墨尔根三处台丁及税收屯丁内,拔派五百名,动用彼处存贮正项钱粮,酌量给予盘费,并置办犁具籽种等项,令其前往呼伦贝尔地方,于明年春间及时耕种。(《清世宗实录》卷 123: 19)

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依据雍正皇帝谕旨采取从外地(齐齐哈尔、瑷琿、墨尔根等处)移来专门从事农垦者进行耕种,以解决呼伦贝尔地区驻防兵丁的粮源。“水手、壮丁内遣一百有四名、往伊敏河、二百人往各尼河”专职种地(《清世宗实录》)。这一年所种之地,选择了“委特克(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维特很河)、锡尼克(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锡尼河)、奎(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辉河)、伊奔等四处地方”。尽管有专职的耕种者,但由于“所种庄稼俱遇霜降”收获甚微,“一百四个汉子地惟收粮三百七十石三斗”。由此,从外地移来“一百有四名”专门从事农垦者们留下“四犏牛农具”返回原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3-0172-0598-005)。

雍正十二年(1734),驻防八旗兵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又在此四处再次进行了分地试种,以求解决粮食自给的难题。这一年的试种由于有前两年的种地基础,获得了一定的收获。据雍正十二年(1734)十一月初八日,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等奏报试种田地情形折中称:

切照今年奴才等遵照军机大臣处议奏行文,于呼伦贝尔地方留四犏牛

农具，遣派呼伦贝尔兵丁八人，择宜试种田之处种田。今据呼伦贝尔地方内大臣永福咨称：据总管达巴哈等呈报称：呼伦贝尔周围委特克地方所种两个汉子地大黄米生长二尺，油麦一尺四寸，大麦一尺三寸，收获粮十仓石九斗。锡尼克地方所种两个汉子地大黄米生长二尺四寸，荞麦二尺三寸，油麦二尺二寸，大麦二尺，收获粮二十二仓石一斗。奎地方所种两个汉子地大黄米生长一尺四寸、荞麦一尺三寸、大麦、油麦一尺二寸，收获粮五仓石七斗。伊奔地方所种两个汉子地大黄米生长一尺，荞麦一尺三寸、大麦、油麦一尺一寸，收获粮八石七斗。此四处八月初八日寒露，所种庄稼均未损，共收粮四十七石四斗。等语。奴才等查得，去年试种田之呼伦贝尔所属伊奔、奎、锡尼克、委特克等四地方，于七月初五、初十日寒露，所种庄稼俱遇霜降，一百四个汉子地惟收粮三百七十石三斗。今年委特克、锡尼克、奎、伊奔等四地寒露较去年迟一个月，所种庄稼俱未赶上霜冻，故八个汉子地收粮四十七石四斗，与去年一个汉子地收粮相比，今年一个汉子地较去年多收二石余。今官兵驻定，仰赖圣主之福，霜降渐迟，定有收成，奴才等来年仍试种，秋收时奏闻。为此谨具奏闻。奴才卓尔海、奴才宗室崇扬和（朱批：好。著仍试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2318）

从上述奏文中可知，如今鄂温克族自治旗是呼伦贝尔地区雍正、乾隆时期开发农业的中心区域，达斡尔人是开发先锋，他们为发展呼伦贝尔农业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二）乾隆时期呼伦贝尔灌溉农业的开发进步

乾隆开年，1736年，达斡尔人仍然坚持试种，但还是以歉收而告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02-02-006-000412-0020）。连续五年的试种歉收，不得不使清廷重新考虑在呼伦贝尔试种一事。

乾隆二年（1737）时有一奏折称：

“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准。将军额尔图奏。驻防呼伦贝尔之索伦达呼尔、巴尔虎兵。地无可耕。又道通俄罗斯。所关紧要。若令悉彻。俱以新兵守边。未协机宜。臣等令参领那木等相度附近。并询问众兵。并言惟兴安山岭之阳。鄂木博齐。及雅尔和鼐等处。地势宽平。水草肥美。既可屯驻。兼宜耕种。若移居其地。每年往呼伦贝尔更番驻防甚便。查

呼伦贝尔兵二千。已拔赴军营。仅余一千驻防。不便更令他移。请以三千兵丁之妻子。尽移鄂木博齐等处。居住耕种。令总管一员。率兵千人。驻呼伦贝尔防守。俟军营二千人撤退时，仍令更代驻防。得旨。若仍派塞楞额总管。余依议。（《清高宗实录》卷45/2A—3A）

清廷一面把最初进入呼伦贝尔三千兵丁内，派出两千名前往前线参战，一千兵驻守边卡、建设各种军事设施等；一面又将其留守家园三千兵丁的妻子“尽移鄂木博齐等处。居住耕种”。呼伦贝尔索伦部的所有官兵及随属为开发建设呼伦贝尔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

乾隆年间，清廷还从新疆调来“塔里雅沁回子”大人小孩妇女等200多人口到呼伦贝尔耕作3年后返回。“塔里雅沁回子”在原来依水而耕的基础上，引入了开修水渠，灌溉农业的生产技术，“疏浚旧有水渠，由喀尔喀河引水达二十余里”、在辉河流域“开挖渠道三十余里，引辉河水至昭额里苏地方”种地，其种植物也有了扩展，这些尝试无疑对农业灌溉技术在呼伦贝尔地区的传播，仍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八、乾隆七年（1742）裁减达斡尔、索伦、巴尔虎等兵丁的缘由

乾隆七年（1742），清廷为了减轻经济压力，对呼伦贝尔八旗进行了一次兵员裁减，裁减中将达斡尔人全部和部分索伦、巴尔虎等兵遣回原籍。对其裁减的原因有着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最初达斡尔人进驻呼伦贝尔时“达斡尔人不愿骨肉分离移居他乡。清廷曾发给种籽叫他们试种，可是他们事先把种籽炒熟后播种，等秋后上报草地严寒，庄稼颗粒不收，因此将他们遣回布特哈原籍”（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1985：24）。又有“达斡尔人因此地严寒种田难以收获谷物而向清廷提出请求获准而全部遣回布特哈原籍”。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清廷与准噶尔议和，战时体制被解除，索伦八旗的兵数也进行了削减，被裁减的兵员，重新交纳貂皮贡，又恢复到布特哈组织中（柳泽明1999）。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是有依据的，而前一种将“种籽炒熟后播种，庄稼颗粒不收”而迁回故里的说法，只是表达了单身戍守边疆的达斡尔兵丁思乡怀亲之情。在当初严厉的军事管束之下，他们不可能，也不能利用“种籽炒熟后播种”的手段实现迁回故里的目的。

清廷于乾隆七年（1742）裁减达斡尔、索伦、巴尔虎等兵丁的过程较为复杂，清廷经过数次调研，数次更改方案后，最终做出了裁减决策。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雍正十年（1732）开始连续数年试种歉收，导致了“皆赖粮谷为生”的达斡尔人生活的拮据。

二是，雍正十二年（1734）初开始，清准双方提出议和的意向，战争状态暂告缓解。

三是，清廷为减轻国库支出，“钱粮不致虚靡”，实施了对所有八旗组织全面进行裁减兵丁的决策。

（一）裁减达斡尔、索伦、巴尔虎等兵丁缘由之一

清廷组建八旗兵丁进驻呼伦贝尔戍边驻防的同时，以“屯垦开发，以边养边”作为经济上立足久远的策略，打算让达斡尔人先去建城池、种田地，为呼伦贝尔的驻防兵丁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布特哈地区）和大兴安岭以西地区（呼伦贝尔地区）有着一定的温差，这里霜降较早，因此连续几年的试种都未获得良好的效果，尤其是为“皆赖粮谷为生”的达斡尔人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首先是，粮谷的缺少使呼伦贝尔地区兵丁及西丹丁难以糊口，气候的严寒及道路的遥远，致使取送口粮也颇为艰难，因此雍正十一年（1733）十二月初二日，护军统领博第等奏称：

呼伦贝尔现有原先迁移时不宜分开同来之索伦、达斡尔、巴尔虎西丹丁共七百九十六人，其中五十五名达斡尔西丹等之父兄弟均皆出征，皆被抽至北路军营，家口尚未迁移，仍在原处，此西丹等若只身在呼伦贝尔地方，并无差事，则难于由家中取送口米，且于看护其妻孥家口、牲畜及种地，人亦不敷。

对此，清廷照博第等所奏，同意暂时将此等五十五名达斡尔西丹遣返布特哈。这是进驻呼伦贝尔一年半后，由于生计问题返回布特哈的第一批达斡尔人。

其次，连续几年的试种粮物均告歉收，导致了达斡尔人生活的不适。乾隆元年（1736）统领哈达哈奏称：

索伦、巴尔虎兵丁，原靠游牧狩猎及牛羊之奶为生，虽地方寒冷，然降雪深浅不等，故尚能维持。唯达斡尔兵丁皆赖粮谷为生，此四年间，粮食歉收，自齐齐哈尔购粮而食者亦有之，向其布特哈地方之亲戚求米而食者亦有之。其居住地方，距齐齐哈尔七百余里，倘自备资釜运米而食，则委实不支。日久之后，不仅呼伦贝尔之达斡尔兵丁力竭，其布特哈地方所住亲戚亦为彼等连累，于其生计无益。（包梅花 2012）

看得出，解决驻防呼伦贝尔兵丁的生计问题，尤其是解决达斡尔兵丁的粮食问题，成为清廷急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对此，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乾隆帝也非常重视，令将此交付兵部从速咨文黑龙江将军额尔图等。遵照旨意，时任黑龙江将军的额尔图提出了将呼伦贝尔地方之三千名兵丁，每年派一千名兵丁至获粮颇丰的鄂木布齐地方，返青时至呼伦贝尔地方防守，草枯之后撤回的“季节性调整驻防之地”的方案。对该方案，后上任黑龙江将军的博第提出了修改意见。提出：呼伦贝尔之地是与喀尔喀、俄罗斯接壤的极为紧要之地，若采用“返青驻防，草枯撤回”的方案，防守之地，尤其是卡伦驻防将空虚七个月，所以驻防兵丁不可撤回。同时博第提出了改进意见，称：“今若草枯之后不撤回驻防呼伦贝尔地方之一千名兵丁，卡伦之兵丁即应由其中派遣，或由移驻鄂木布齐兵丁内派出之处，请一并指明咨复”。时至乾隆四年（1739）八月时，经大学士鄂尔泰的议复，决定：免其遣返布特哈，将呼伦贝尔地方之三千名兵丁，移驻鄂木布齐地方，每年轮派一千名到呼伦贝尔驻防。

再其次，清廷每年轮派驻防与种田相结合的管理决策，加大了国库的开支。官兵移驻鄂木布齐之后，事与愿违，兵丁及随属生存状况仍然不尽人如意，仍发生诸多分歧。对此博第提出：“实致靡费国帑于无关紧要之处，与其靡费钱粮驻守无用之处，将情愿种田为生之索伦、达斡尔兵丁皆仍遣回其原布特哈地方，进贡貂皮”。于是，乾隆六年（1741）九月二十四日，副都统衔头等侍卫马尔拜献策，提出了按照其各自之习性，相应请将索伦、陈巴尔虎等安置于呼伦贝尔等地游牧狩猎，于卡台行走，将达斡尔等安置于鄂木布齐地方，把游牧与种田者分开来管理的建议。对此建议乾隆皇帝朱批：着将此事交付博第、塔尔岱共同办理。博第等为了慎重落实皇帝旨意，派轻车都尉阿岱、佐领佛保会同该总管班图、托勒德尔前去面询拟驻呼伦贝尔、鄂木布齐此二处之兵众。其面询的结果是，情愿在呼伦贝尔地方游牧为生的索伦兵 1308 名、陈巴尔虎兵 297 名，情愿在鄂木布齐等地居家种田为生的索伦兵

675名、达斡尔兵720名。即共有1605人情愿在呼伦贝尔地方游牧渔猎，情愿住鄂木布齐者为1395人。从这个数字看来，达斡尔兵几乎全部情愿留在鄂木布齐地方以耕种为生。基于这种情况，博第等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将情愿种田为生之1395名索伦、达斡尔遣回布特哈地方，进贡貂皮，俟出缺加以裁汰，则于公于私均皆有利。于是在乾隆七年（1742）四月十八日，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照博第等所奏，做出了将1395名索伦、达斡尔兵丁连同其子弟内西丹遣回布特哈原籍，重新回到了岭东地区的决定。这是将达斡尔、鄂温克人等迁回布特哈地区的又一个原因之一。

（二）裁减达斡尔、索伦、巴尔虎兵丁原因之二

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雍正帝听说准噶尔噶尔丹策凌有议和意向的传言后，以侍郎博鼐、内阁学士阿克墩和副都统罗密作为谈判代表前往准噶尔进行了议界与贸易谈判，但几经谈判均未达成协议。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乾隆帝继位，此时清廷面临国内苗民起义而兵马加增，耗费钱粮，国库拮据局面，因此亟须休养生息，稳定国内局势以巩固统治。而准噶尔方面虽然在雍正年间略有小胜，但其实力根本无法与清廷较量，又有哈萨克、布鲁特在其背后的牵制，所以准噶尔急于求和，想尽快恢复与内地的贸易关系。正在此时，京城满洲正白旗的塞楞额（达斡尔族郭博勒氏）于乾隆元年（1736）被任命为副都统衔来到呼伦贝尔训练索伦巴尔虎等八旗官兵，乾隆二年（1737）执掌关防，直至乾隆三年（1738）年末被授为镶蓝旗汉军副都统。但由于新任呼伦贝尔副都统都依那没能及时到位，塞楞额一直兼职到乾隆四年（1739）年初。在此期间，塞楞额因清准双方进入和平状态且朝廷经费紧张，于是上奏清廷：“今赖圣主之洪福，军机之事俱定，除戎兵之外，并无用兵之处。既如此，与其使此驻防呼伦贝尔之三千官兵，每年耗四五万两而居，不如照旧例退回布特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卷1220第1件）。与此同时，布兰泰也提出了与塞楞额相应的建议，但是由于此时清准和议还未正式达成，该奏文转至军机处后，鄂尔泰等军机大臣议复：“俟定边事毕，再将如何办理之处核定议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卷1220第1号第2件），致使塞楞额、布兰泰二人的提议被撂置了起来。

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清准双方经过6年谈判才正式达成协议进入了和平共处的局面。由此，清朝政府为使战后“钱粮不致虚靡”，再次提出了对北部边境“索伦八旗”及新巴尔虎兵员进行核减裁汰的指令。例如，乾

隆七年（1742）在核减“索伦、达呼尔兵一千四百二十四名还驻打牲处”以后，当年继续核减新巴尔虎兵时指出：“查前由达牲处挑三千名添驻呼伦贝尔，至喀尔喀贝子彦楚卜多尔济属下挑去二千四百名，亦移驻呼伦贝尔。此项兵皆非额设。特为训练，以备军营更调。数年来军务告竣，大兵具已撤回，若仍留驻扎，与旧索伦、达呼尔兵一体当差，碍难裁减钱粮”。同时认为“驻台用官兵六百余名，为数较多，请将防边兵核减足用”。并指令黑龙江将军博第、呼伦贝尔副都统玛尔拜就如何裁汰新巴尔虎兵“共同核议，酌定额缺。照撤回达牲处之旧索伦、达呼尔例陆续裁汰，庶额外兵渐次核减，钱粮不致虚靡。”于是将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兵，除驻台、防边用兵外，“一千四百四十名兵丁作为额兵，其多余兵丁皆俟陆续出缺加以裁汰”（《清高宗实录》卷177/3B—5A）。由此，乾隆七年（1742）为使“钱粮不致虚靡”，清廷从呼伦贝尔地区裁减的不仅仅是达斡尔人，还有不少索伦、巴尔虎等官兵。

九、乾隆七年（1742）裁减兵丁后对呼伦贝尔翼佐及防区牧地的调整

清廷将达斡尔、部分索伦、巴尔虎等遣回原籍后，驻防呼伦贝尔的“索伦八旗”仍编为左右两翼八旗，将原有50个佐调整为24个佐。每佐领40丁，共计960丁。其余兵丁皆遭裁汰。所调整后的索伦左、右翼24佐编制如下表：

表 15

翼别	旗别	佐数	备 考	姓氏
索伦左翼	镶黄	3	第一佐内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其余为鄂温克人。	郭姓
	正白	3	第一佐内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其余为鄂温克人。	敖姓
	镶白	3	第一佐为鄂温克人、巴尔虎混合，其余为巴尔虎人。	
	正蓝	3	全系巴尔虎人。	
索伦右翼	正黄	3	第一，第二佐内有一部分达斡尔人，其余为鄂温克人。	孟姓
	镶蓝	3	该三旗完全是鄂温克人。民国8年，索伦左翼镶白旗第2、3佐及正蓝旗3个佐所属巴尔虎人，另组成陈巴尔虎旗，分为12佐。	
	正红	3		
	镶红	3		
计	八旗	24佐		

资料来源：《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页。

上述编制从乾隆七年（1742）开始，延续到民国八年（1919），差不多有近200年之久。

乾隆七年（1742），在行政区划上，清廷将达斡尔、鄂温克等兵遣回布特哈原籍后把所剩索伦左右两翼八旗的驻屯游牧地进行调整，详情见表16。

表 16

旗 别	游 牧 地 界 址	户 数
索伦左翼镶黄、 正白二旗	自西呢克河源起，北止海拉尔河止，一百五十里许；东自扎敦河起，西至伊敏河止，二百一十里许	二旗共计 二百五十户
旧巴尔虎镶白、 正蓝二旗	南自辉河起，北至固尔毕舍利卡伦止，二百八十五里许；东自库勒都尔河起，西至西林布尔都泡止四百里许	二旗共计 八百三十户
索伦右翼正黄、 正红二旗	南自喀喇图山起，北至西伯山止，一百九十五里许；东自伊敏河起，西至辉河止，一百二十里许	二旗共计 六百五十九户
索伦镶红、 镶蓝二旗	南自内兴安岭山根起，北至喀喇图山止，一百一十里许；东自鄂依那河起，西至辉河止一百二十里许	二旗共计 二百一十六户
额鲁特镶黄旗 两个牛录	南自鄂依那河起，北至西尼克河止，一百五十里许；东自库奇老山起，西至伊敏河傍喀喇霍吉尔泡止，一百二十里许	二牛录共计 三百六户

十、海拉尔达斡尔人的形成及在“索伦八旗”翼佐中的分布

（一）海拉尔达斡尔人的形成

在乾隆七年（1742），清廷将驻防呼伦贝尔的达斡尔兵丁全部遣回布特哈原籍时，时任呼伦贝尔副都统衙署笔帖式的达斡尔郭博勒哈拉^①满那莫昆^②的奎苏，敖拉哈拉登特科莫昆的范恰布，由于公职在身，未准返回，分别被编入索伦左翼镶黄旗第一佐和索伦左翼正白旗第一佐内。乾隆五十四年（1789），莫日登哈拉阿尔哈昌莫昆珠善因军功被任命为呼伦贝尔额鲁特总管，三年期满，欲回布特哈原籍未准而继续担任此职。因此他把家属和自己的一位兄弟迁至海拉尔地区，编入索伦右翼正黄旗第一佐。后来又有达斡尔敖拉哈拉库热浅莫昆之3户和达斡尔鄂嫩哈拉博斯阔浅莫昆之4户，陆续迁来呼伦贝尔，编入正黄旗第二佐内。以上达斡尔四个姓氏五个莫昆，世代在呼伦

① 哈拉，姓氏之意。达斡尔人在“哈拉”之上冠以不同哈拉（姓氏）的名称，成为各哈拉的全称。

② 莫昆，从哈拉分化出的血缘关系更为亲近的分支。

贝尔海拉尔地区繁衍生息，形成海拉尔达斡尔人，俗称海拉尔浅。^①这部分达斡尔人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他们都是清廷统一派遣到呼伦贝尔地区戍边的八旗军人；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明确翼佐编制的八旗旗人；三是均被朝廷登记在案，享受俸禄的八旗军人。

虽然这个群体由四个姓氏五个莫昆组成，但近 300 年来总人口没有太大的起伏。从最初的两户不足十口人开始到民国时期达到三四百人，人口最多时也不足千人。如今海拉尔达斡尔主要聚居于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南屯）、巴彦嵯岗苏木莫和尔图、海拉尔市区等地。

20 世纪 20 年代，丹麦学者亨宁·哈士伦曾在由中国和瑞典共同筹建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其间他们来到呼伦贝尔考察，后来形成《蒙古人和神》一书，其中写道：“在海拉尔地区各小邦中最杰出的要数达斡尔族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精通两种语言的书写方式。他们以机智和博学闻名已久，所以颇具影响力。达斡尔人富有、彬彬有礼，易于接受新生事物，但他们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抛弃本民族文化的根基”（亨宁·哈士伦 1999：320—321）。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其 1925 年出版的《东北亚洲搜访记》一书中记述：“呼伦贝尔之政厅，设于海拉尔，附近一切土地人民，均由此政厅所支配……属于呼伦贝尔政厅之人类，有种种民族。例如多尔（指达斡尔——编者）、索伦（指鄂温克——编者）、奥洛匈（指鄂伦春——编者）、巴尔喀（指巴尔虎——编者）、蒙古、爱留德（指额鲁特——编者）、孛里亚（指布里亚特——编者）等相集”。其人口“亦不过三万”。“此等民众之中，为呼伦贝尔政厅之中坚者，即多尔人（指达斡尔——编者）。自前记之副都统胜福，余所会见之左厅长成德，下及职官之重要者，皆多尔人，握其权力……文化亦相当进步……为历史上知名之民族……多尔人较之附近民族，实富于才能，长于智巧，而举有相当之成绩焉”，“呼伦贝尔政厅之首领，以及其他要职，几尽为多尔人所占，初非偶然，此亦不能不注意之点也。夫然，则多尔人，于政厅管内三万人口中，果有若干？实不过三四百人。若此少数之民族，握呼伦贝尔政厅之权力，可以左右之，信为富于兴味之事实……”。

① 达斡尔人习惯上把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人们，按其哈拉或莫昆后加“浅”来称呼，表示生活在同一地域的群体。如把居住在布特哈地域的达斡尔族人称为“巴特罕浅”；把居住在齐齐哈尔一带的达斡尔人称为“浩通浅”；把居住于海拉尔一带的达斡尔人称为“海拉尔浅”等。

又如，日本学者藤山一雄在其《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被枪决的内幕》一文中说：“截至 1936 年，（呼伦贝尔）草原大约有 2.7 万名游牧民散居各处，而贵福一行的达斡尔族却只有 386 人，其中壮年男子据说只有 165 人。自清朝 300 年以来，被称作‘达斡尔政权’，掌握草原主权，广施仁政，颇得好评……据说连张作霖主持的东北政权，对于其实力也难以敌对。”

从上述记述以及其他一些史料中得知，从清末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达斡尔人在呼伦贝尔政厅中占据较多的数量。

（二）达斡尔人在“索伦八旗”翼佐中的分布

从雍正十年（1732）至 1933 年的 200 年间，海拉尔地区达斡尔人行政区划及居住地点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现将 1932 年以前的海拉尔达斡尔族户数、居住地点以及行政区划按氏族别列表如下：（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 1985：24—25）

表 17

氏族别		旗佐别		居住地点	户数	备注
哈拉	莫昆	旗	佐			
敖拉	登特科	索伦左翼 正白旗	第一佐	南屯 莫和尔图 海拉尔	18 8 2	1. 这些翼佐都是与鄂温克族混合编制。 2. 按莫昆别：登特科 28 户；满那 34 户；阿尔哈昌 22 户；博斯呼浅 2 户；库热浅和白亚格尔各 2 户。如按居住地点算，南屯 47 户；莫和尔图 16 户；西屯 21 户；海拉尔 8 户。
	库热浅	索伦右翼 正黄旗	第二佐	西屯	2	
	白亚格尔	索伦左翼 镶黄旗	第一佐	南屯	2	
郭博乐	满都	索伦左翼 镶黄旗	第一佐	南屯 莫和尔图 海拉尔	25	
					8	
					1	
孟尔丁	阿尔哈昌	索伦右翼 正黄旗	第一佐	西屯 海拉尔	17	
					5	
鄂嫩	博斯呼浅	索伦右翼 正黄旗	第二佐	南屯 西屯	2	
					2	
总计	六个莫昆				92	

十一、组建驻防呼伦贝尔八旗的特点

清朝政府组织这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兵丁迁居呼伦贝尔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安置时对传统的民族习俗以及生计也考虑得十分周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雍正皇帝亲自主抓，指派专人面授机宜，到呼伦贝尔实地勘查，做出具体规划上奏。又经朝廷大臣们的共同审议，雍正皇帝签发公文后，由朝廷负责精密组织、严格要求、统一行动。可以说，呼伦贝尔海拉尔城的诞生，是雍正治国方略的产物。

二是：这次迁居行为完全属于军事性质。为了军事驻防的需要，编为八旗成为披甲，专事巡边防御，应时出征参战。由朝廷任命官爵，编排旗佐，发给戎装、兵器和旗纛进行军训，铸制关防官印，规定俸禄，取消贡赋，不但组织严密，军纪严明，义务明确，财力也十分充沛。在其待遇等方面与布特哈八旗以及其他驻防八旗均有不同之处。例如，虽然取消了贡赋，但只给半个俸禄，钱粮数额比一般的驻防八旗少，并且继续把游牧、狩猎等作为生活基础。

三是：清廷根据呼伦贝尔地理位置及气候特点，在选派兵丁对象时，首选的是骁勇尚武、谙熟畜牧狩猎的达斡尔、索伦、鄂伦春、巴尔虎等游牧（猎）民族。将有共同信仰（萨满教）、共同心理素质以及共同民族发展历程的不同民族组成共同体，建立了一个长久稳定、永戍边疆、似如铜墙铁壁的边防部队。

四是：在具体安置和管理上，清廷注意尊重各族民俗（这些民族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即萨满教）。清廷虽然采取的是八旗军制，但基本上没有打乱原有各民族以及各民族间的部落组织形式，而是顺其原有部落组织，尽量做到不混编，不相混杂，分别屯聚，并划定出固定的游牧地界。这种“因其游牧性质而定为特别之制”的“因俗而治”的管理方式，既照顾到了游牧民族的传统组织习惯，又实现了清廷的直接管辖，从而确立了稳定的呼伦贝尔驻防体制。

五是：虽然呼伦贝尔军事驻防绝不等同于移民，但其特点是人口构成非仅官兵，有部分随属，朝廷赐给生产和生活资料，身份亦兵亦民，兼具驻防和移民两种性质。

六是：呼伦贝尔八旗与满洲八旗相比，中间缺少“甲喇”这一层环节组织。而且每个佐只有60人，每个旗不超过360人，因为“索伦八旗”是50个佐，合起来就3000人。这样就产生了同样是旗（固山），但满洲八旗有7500名士兵的大旗和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每个旗只有360名士兵的小旗的区别。总之，满洲八旗和“索伦八旗”虽然都叫“八旗”，但其组织形式不相同，领导层次、士兵人数、军官职衔都不一样，因此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十二、驻防呼伦贝尔八旗组织名称

严格来讲，清廷当初组建八旗兵进入呼伦贝尔，并没有在“八旗”组织上冠以“索伦”名称。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雍正、乾隆朝的公文档案中几乎没有发现“索伦八旗”字样。如果清廷在组建八旗时，命名为“索伦八旗”，就应该在关防印上注明“索伦八旗”字样。但是，雍正十年（1732）五月二十五日，大学士鄂尔泰在“奏发呼伦贝尔总管关防印”时确定的满文文字为：*hulun buir i jergi bade tebuhe cooha be kadalara uheri da i guwan fang*。汉译为：“管理驻扎呼伦贝尔等处兵丁总管关防”。再则，在清廷的奏文中，对呼伦贝尔总管的称谓大多以“管理呼伦贝尔索伦巴尔虎兵丁事物总管”“呼伦贝尔等地索伦巴尔虎兵丁副都统衔总管”“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呼伦贝尔索伦左（右）翼总管”“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右）翼总管”等来表述，却没有“索伦八旗”或“索伦八旗总管”之说。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索伦八旗”称谓流行的缘由无非有以下两点：一是与明末清初以来对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统称为“索伦部”的历史习惯有关；二是在组建驻防呼伦贝尔八旗时，索伦兵丁占总兵丁人数的一半以上，由此“索伦八旗”在民间以及史料中流行开来。

由于呼伦贝尔先后迁入额鲁特、巴尔虎等民族而又新组建了八旗组织，所以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史料中又出现了“呼伦贝尔八旗”“呼伦贝尔驻防八旗”“五翼内外八旗（指索伦左右翼旗为内八旗、新巴尔虎左右翼旗、额鲁特旗为外八旗）”“呼伦贝尔五翼蒙旗”“呼伦贝尔五翼总管旗”“游牧八旗”等各种统称。所有这些均指索伦左、右两翼八旗、额鲁特一翼一旗和新巴尔虎左、右两翼八旗等5个翼17个旗。这些不同的名称留存于史乘。

另外，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史书中将呼伦贝尔地区直接以“巴尔虎”来叙述。其实这种对呼伦贝尔地区的称呼来自俄国人。他们“对于现在的呼伦贝尔直接以巴尔虎名之”（郭道甫1987：13）。又由于新、陈巴尔虎人“合计起

来，实占全人口三分之二，所以呼伦贝尔的蒙古民族，统称为巴尔虎”（郭道甫 1987：13）。同时在很多史料中习惯将索伦、巴尔虎、额鲁特五翼总管旗和托河路鄂伦春二佐一旗统称为“蒙旗”，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额鲁特蒙古等民族统称为“蒙人”来表述，而且，这种称呼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郭道甫在 1931 年所著的《呼伦贝尔问题》一书中说：“在满清时代，索伦骑兵，很为著名；而呼伦贝尔的索伦骑兵，尤为最精……以尚武著名于中国”，因而被称为是“强悍的民族……可是到了最近的呼伦贝尔，就得了另外的名称，那就不仅是强，又添了一个富”（郭道甫 1987：13—18）。20 世纪初，总人口只有 5 万的呼伦贝尔各族人民，其牲畜总头数就达到了 255 余万头只。于是“巴彦巴尔虎”（意即富饶强盛的巴尔虎，泛指今呼伦贝尔岭西地区）名称由此誉满天下。

这里需要指出的和不可回避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如果说最初进驻呼伦贝尔时是以索伦（鄂温克）民族为主体民族的话，随着巴尔虎蒙古的迁入以及八旗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巴尔虎蒙古族的人数在呼伦贝尔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因此，呼伦贝尔的巴尔虎蒙古族，自然而然构成呼伦贝尔诸多民族的主体民族，“巴彦巴尔虎”（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额鲁特蒙古等）的百万牲畜，也是如今呼伦贝尔畜牧业得以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巴岱，金峰，额尔德尼

1992 卫拉特史迹蒙文.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包梅花

2012 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八旗历史研究. 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郭道甫

1987 呼伦贝尔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印.

亨宁·哈士伦

1999 蒙古的人和神. 徐孝祥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

1986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册报志稿. 边长顺，徐占江译. 呼伦贝尔盟历史研究会.

柳泽明

1999 清代黑龙江地区八旗制的施行和民族的再编. 蒙古学信息 1：31—38.

内蒙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85 有关达呼尔鄂伦春与索伦族历史资料第二辑. 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历史语言文学学会.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

1985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徐世昌

1965 东三省政略卷一边务·呼伦贝尔篇. 台湾: 文海出版社.

徐宗亮

黑龙江述略卷五 转引自周喜峰著《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第 273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80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3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合肥: 黄山书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档号: 3-1732 1-1730.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大学士鄂尔泰等: “为议复副都统塞楞额裁撤呼伦贝尔索伦达呼尔官兵事奏”. 卷 1220, 第 1 号第 2 件.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塞楞额: “为裁撤呼伦贝尔索伦达呼尔官兵事奏”. 卷 1220, 第 1 件.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胤禛: “为托勒德尔、阿比锡克、莽古达三人各赏四百两银事”. 档号: 03-18-009-000003-0001-0086.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黑龙江将军卓尔海: “奏将黑龙江余丁照京城之例挑为养育兵折”. 档号: 03-0171-0165-007.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 “奏卓尔海请将黑龙江余丁照京城之例挑为养育兵之处无庸议折”. 档号: 03-0171-0165-008.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雍正十年三月二十八日黑龙江将军卓尔海: “奏挑选三千名索伦达斡尔兵丁于呼伦贝尔等处驻防折”. 档号: 03-0171-0318-008.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大学士鄂尔泰: “奏议卓尔海所奏于呼伦贝尔等地驻兵等事折”. 档号: 03-0171-0318-009.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雍正十一年七月初三日大学士鄂尔泰: “奏议卓尔海所奏将驻呼伦贝尔之索伦达斡尔巴尔虎分入上三旗折”, 档号: 03-0171-0167-007.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卓尔海: “奏议呼伦贝尔设八

卡伦及与喀尔喀、俄罗斯贸易事宜折”. 档号：03-0172-0437-016.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暂署黑龙江将军印务奉天将军那苏图：“奏闻呼伦贝尔伊棉等处霜早天寒不宜耕种请量留农具再行试种折”. 档号：03-0172-0598-005.

内阁奏折 乾隆元年十二月初三日护理黑龙江将军印务副都统布沙尔：“报呼伦贝尔官兵试种粮食被旱歉收情形事”. 档号：02-02-006-000412-0020.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年、丁巳、六月、甲戌（1737年7月14日），卷45/2A—3A.

《清高宗实录》乾隆七年、壬戌、冬十月、甲辰（1742年11月15日），卷177/3B—5A.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三十六年五月、丙申，卷183，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版.

《清世宗实录》卷123，第19页.

《清世宗实录》雍正九年辛亥十一月，甲申条，卷112.

《清世宗实录》雍正十年、壬子、秋八月、壬申（1732年10月6日），卷122/13A—B.

《清世宗实录》雍正十年十二月乙亥.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olon Aiman (Tribe) Stationing in Hulun Buir

—A Daur Perspective

A Li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rst-hand source from No. 1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this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3000 Daur, Evenki, Oroqin and Bargu soldiers stationed in Hulun Buir. The historical context, march course, fundamental organization (Yizuo), stationing mechanism as well as military installation of the first two years are explored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Daur soldiers in 1742 (7th Year of Qianlong Emperor, Qing Dynasty) and the formation of Hailar Daur.

Keywords: Solon Aiman (tribe); Stationing Hulun Buir; formation of Hailar Dau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 第五辑/曲枫主编. —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 2022.9

ISBN 978-7-5426-7796-9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42304 号

北冰洋研究(第五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 箱 / sdxsanlian@sina.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400 千字

印 张 / 23.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7796-9/D·543

定 价 / 8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